

国际经济与金融

系列(2)



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研究

中国历史发展的经验

袁欣 著

DUIWAI
MAOYI
JINGJI
XIAOYI
YANJIU

中山大学出版社

国际经济与金融系列 (2)

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研究

——中国历史发展的经验

袁欣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研究: 中国历史发展的经验/袁欣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5

(国际经济与金融系列: 2)

ISBN 7-306-02265-2

I. 对… II. 袁… III. 对外贸易—经济效果—研究—中国
IV. F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6735 号

责任编辑: 周建华

封面设计: 奇云

责任校对: 舟雨

责任技编: 黄少伟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编辑部电话 (020) 84111996, 84113349

发行部电话 (020) 84111998, 84111160

地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编: 510275 传真: (020) 84036565

印刷者: 广州市番禺市桥印刷厂

经销者: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规格: 889 mm × 1194 mm 1/32 7.625 印张 22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作者简介

袁欣，男，1968年生，山东青岛人，经济学博士。先后求学于山东大学社会学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曾任职于天津市政府机关、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上海市金融证券行业。现任教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出版《对外贸易结构的动态演进》等学术著作，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内 容 提 要

对外贸易经济效益是指对外贸易在其过程中对于整个经济系统的各种作用力量的总称。中国近代时期的对外贸易作为当时最为活跃的经济因素之一，在经济的深层次上影响着当时及当今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走向。本书运用经济学基本理论及其所能提供的方法，对历史资料进行了重新的嫁接和组合，从对外贸易利益的变动趋向、出口竞争能力和出口竞争优势等微观角度，以及从对外贸易与现代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升级的相互关系等宏观角度，探讨了近代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经济效益问题。

目 录

导 言	(1)
一、国民价值向国际价值的转移是对外贸易的基础	(1)
二、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含义	(5)
三、选题的意义和研究的方法	(6)
四、本书的结构和资料的运用	(10)

上编 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微观分析

第一章 对外经济关系中的贸易条件	(15)
一、“贸易条件”的理论说明	(15)
二、综合贸易条件指数	(16)
三、个别贸易条件指数	(27)
第二章 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出口竞争力	(45)
一、度量指标的选择	(45)
二、贸易特化系数	(47)
三、国际市场占有率	(62)
四、出口优势指数	(77)

下编 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宏观分析

第三章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	(93)
一、对外贸易的发展	(93)
二、对外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109)
三、对外贸易与工农业发展	(118)
第四章 对外贸易与经济结构变动	(139)
一、对外贸易促使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	(139)
二、对外贸易促使产业结构的变迁	(144)
三、对外贸易促进消费结构的变化	(158)
四、对外贸易与资本形成的关系	(168)
附录 1 主要进出口产品价格指数	(178)
附录 2 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与工业“进口替代”	(209)
参考文献	(222)
后 记	(234)

导 言

一、国民价值向国际价值的转移是对外贸易的基础

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交换，必然受国际价值规律作用的支配。研究国民价值向国际价值的转移，是研究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前提条件，因为没有商品的国民价值向国际价值的转移，也就不会产生国民价格和国际价格的差异，对外贸易也就不会存在，由此所产生的一切经济效益——微观的和宏观的也就无从谈起。

商品的国民价值向国际价值转移的内在机制，必须借助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予以说明。马克思曾经把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等问题作为其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中有关对外贸易、国际价值等都有精辟、深刻的议论。尽管如此，马克思本人没有完成他的研究计划，对这些问题并没有形成全面系统的论述。但是，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毫无疑问地可以用以解释商品国际价值的形成。

商品的国际价值是在国别价值的基础上形成的。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情地破坏了自然经济的基础，并把分散的地方市场联接成一个整体的全国市场，在这个整体的全国市场上，它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量都是由其抽象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①现有的社会标准的生产条件，是指当时的一个生产部门大多数产品生产时已经达到的技术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2页。

装备水平。但在社会标准生产条件下，由于生产者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强度不同，生产某种商品所花费的时间并不一样，在此情况下，价值就只能由社会的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强度，即中等的劳动熟练程度与强度决定。

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商品在国际间的流通使各个国内市场进一步联合成更扩大的国际市场，社会劳动获得了更加全面的发展，它不仅作为个别国家的劳动，而且作为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劳动而出现。当商品交换变成世界性的交换，社会劳动便具有了普遍的国际性质，“真正的价值性质，是由国外贸易才发展的，因为国外贸易才把里面包含的劳动，当作社会的劳动来发展”^①。所以，使国民劳动具有国际劳动或世界劳动的资格，同时使国民价值转化成国际价值，以国际分工为联系的世界市场的发展和形成是其首要的条件。

商品的国别价值量和国际价值量都是人类劳动的凝结物，尽管两者在量上是有差别的，这种量的差别所决定的价格不同导致了商品在国际间的流动，但两者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商品的国别价值既然由国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那么商品的国际价值自然就由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在世界市场上，“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就形成了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②，这个“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可以看作是世界的或国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国际价值量就是由这个“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所决定。但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到底如何计量，马克思本人未加论述。前民主德国学者科尔梅认为国际价值量的近似值可以这样来计量：“一个‘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等于一个单位的国际价值，一种商品的国际价值就是各国生产该商品所需的国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加权算术平均数，权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94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14页。

数是该商品的各国出口量，或者是各供出口的生产量。”^① 科尔梅的观点表明：只有进入国际市场的那一部分商品才实现了国民价值向国际价值的转移，也就具有了国际价值量，尚未进入国际市场的那一部分商品并没有实现国民价值向国际价值的转移，也就不具备国际价值量的属性。

也就是说，进入国际市场的那一部分国际价值量除了受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的影响外，还与贸易国的贸易量即世界市场联系的广度和深度密切相关。如果绝大多数的国际贸易商品由大致相同的正常的国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生产出来，则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与生产该商品的各个国家的社会必要劳动接近，在此情况下，商品的国别价值与国际价值基本吻合。如果国际市场上某种商品的总量中绝大部分是在比较差的条件下生产的，尽管该商品在另外一些国家所占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很少，但其贸易量在国际市场上所占份额太小，该商品的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仍由生产条件较差但其贸易量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商品的国际价值与该商品在该国家的国民价值相接近。如果国际市场上某种商品的总量中绝大部分是在比较好的条件下生产的，尽管该商品在另外一些国家所占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很多，但其贸易量在国际市场上所占份额太小，该商品的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由生产条件较好且其贸易量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商品的国际价值与该商品在该国家的国民价值相接近。

国民价值一旦转化成为国际价值，国际价格便出现了。商品的价值是用货币来表现的，价值的货币表现就是价格，价格水平的高低首先取决于商品价值量的大小，价格水平的变动也首先取决于商品价值量的变化，价值是价格的内容和客观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价格表现价值，不仅取决于商品的价值量，而且取决于货币本身的价

^① 这是科尔梅在《卡尔·马克思的国际价值论》中的观点，引文见丛培华：《国际价值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30 ~ 131 页。

值量；商品的价格水平不仅取决于商品价值和货币价值量的变动，而且与商品的供求关系密切相关，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正是价值规律在价值实现中的表现形式。国际价格最终是由国际价值所决定的，但是国际价格也同样受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因为国际市场垄断的程度可能比国内市场垄断的程度高，国际价格背离国际价值的程度也就可能更大。

由此可见，参与国际贸易的商品可以获取双重的利益：第一，当国际价值大于国民价值时，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交换受国际价值规律的支配，贸易参与国可以从中获利；第二，当国际价格高于国际价值时，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交换又可以获取国际价格背离国际价值那部分的利益。国际贸易商品的最终获利水平取决于这两者之和。用公式表示如下：

$$P_t = P_v + P_p$$

其中： P_t ——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商品获取的利益；

P_v ——国际价值大于国民价值的部分；

P_p ——国际价格高于国际价值的部分。

那么，对于那些国民价值高于国际价值的不发达国家来说，以国际价值折合的出口商品所实现的国民价值量会低于商品在国内出售时所实现的国民价值量，但这并不妨碍劳动生产率低的国家利用国民价值与国际价值的差额来获取比较利益，虽然“它们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物化劳动多于其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①。

对外贸易的基本动机是为了获取经济上的利益。由此可见，国民价值向国际价值的转移是对外贸易的基础。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5页。

二、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含义

一般情况下，人们所说的经济效益是指：“在经济活动中为了达到一定的经济目标所耗费的劳动和由此所取得的成果之比，简言之，即投入产出之比”^①，因此，对外贸易经济效益也就成了“一定时期内投入对外贸易领域的劳动和由此取得的成果之比”^②。本书认为这个概念只是一个狭义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概念，它只是简单地突出了投入产出之比，强调了对外贸易活动的盈利性问题。诚然，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都连接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涉及两种价值（国内价值和国际价值），通过商品的国际交流，贸易参与者不仅可以获得一般的经营成果，而且可以通过国内价值和国际价值的转移，获得国际比较利益（ P_c ）和国际垄断利益（ P_p ），从而使国际贸易比国内贸易能实现更多社会劳动的节约。但是狭义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益”概念的内涵至少存在着以下三个缺陷：

第一，它缺乏动态性的因素。简单地考察对外贸易过程中投入产出之比，只能是对投入产出的静态分析。有时，尽管投入大于产出，从狭义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益角度来看是缺乏经济效益的，但从长期来看，随着投入产出的边际置换率的不断变化，产出最终会大于投入，前项的投入大于产出只是对外贸易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第二，它缺少宏观层次的理解。对外贸易过程中的投入产出之比，不论是一种出口商品、一个外贸企业的个体投入和产出，还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总体的投入和产出，其着眼点都是停留在微观层次上的。对外贸易对整个经济系统的国民收入的增长所起的作用在这里被忽略掉了。

第三，它停留在数量关系的认识上。数量分析是经济分析的一种重要手段，但绝对不是经济分析的全部，更不是经济分析本身。如对

① 王绍熙等主编：《中国对外贸易概论》，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47 页。

② 王绍熙等主编：《中国对外贸易概论》，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47 页。

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是通过直接的、间接的等若干个层次展开，决不是一两个经济增长模型所能完全说明的了的。而且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非止于经济增长一端，它对整个经济结构优化或称高级化往往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对“对外贸易经济效益”内涵的认识不宜过于偏狭。本书认为，“对外贸易经济效益”是指对外贸易在其过程中对于整个经济系统各种作用力量的总称。

因为观测或分析角度的不同，对外贸易经济效益在层次上的分解也有区别。从考察对象的范围来看，对外贸易经济效益分为个体经济效益和总体经济效益。对外贸易的个体经济效益是指对外贸易活动对一种商品、一个企业、一个产业的经济影响；对外贸易的总体经济效益是指对外贸易活动对一个国家全面的经济影响。

从对外贸易产品的流向来看，对外贸易经济效益分为出口经济效益和进口经济效益，两者结合在一起分析，则称为对外贸易进出口的综合经济效益。

从不同层次来看，对外贸易经济效益分为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对外贸易微观经济效益是指对外贸易活动的直接经济成果，既包括总体的经济成果，也包括单种商品的经济成果；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益是指对外贸易对整个经济系统的国民收入增长和经济结构优化的影响，它是对外贸易总体经济效益的一个方面。

本书对中国“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考察主要从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两个层次上展开，并由此构架整本书的逻辑体系。在这个逻辑框架内，既分析对外贸易的个体经济效益和总体经济效益，也分析对外贸易的出口经济效益和进口经济效益（参见导言第四部分）。

三、选题的意义和研究的方法

中国的对外贸易尽管早有丝绸之路上的驼铃悠扬，有白瓷青釉的绚丽光彩，但在 2000 多年的时间里，它仅仅“犹如古老的长袍镶上的一条花边”。对外贸易深刻地嵌入中国的经济生活，影响中国经济

的性质，导引中国经济的走向，则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事情。这其中又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 19 世纪 60 年代至 20 世纪 30 年代，另一个阶段是 20 世纪 80 年代迄今。19 世纪 40~50 年代只是前一个阶段的制度准备期，20 世纪 30~70 年代则经历着战乱和意识形态主导下的被动的闭关锁国。

本书对前一个阶段中国对外贸易的综合经济效益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种长期时间序列框架下的研究，其意义在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当前中国对外贸易乃至经济生活的诸多性质和特征可以追溯到这段时期，正所谓现实是所有历史的总和，分析这一阶段的中国对外贸易史有助于深化对当前中国对外贸易的认识；第二，经济学发展的历程表明，经济现象长期时间序列的分析和观察可以极大地验证和丰富经济理论本身，比较著名的例子有 A. 菲利普斯 1958 年研究英国 1861~1913 年工资变化率和失业率的实际资料时发现了菲利普斯曲线，H. B. 钱纳里和 M. 赛尔奎因 1975 年研究 1950~1970 年 101 个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经济结构时进一步验证和发展了经济结构转变的“发展型式”理论。

为了行文的简洁和方便，我们把所研究的这段时期称为“中国近代时期”。关于中国近代时期对外贸易的研究，早在当时就为时人所重视，武育干、何炳贤等人的著作都是那时期集大成的研究^①，基本上可谓全面、详实。面对卷帙浩繁、内容庞杂的海关贸易报告^②，杨

① 武育干：《中国国际贸易概论》，商务印书馆 1930 年版；何炳贤：《中国的国际贸易》，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

② 近代中国的海关贸易统计报告起自 1864 年，止于 1948 年，是由外籍管理人员控制下的中国海关总署主持编制的，该报告全套统计总册数达 2000 余册，含中日战争时期伪满洲国、伪汪政权部分，今已成为研究近代中国经济唯一可靠而系统的资料。南开大学图书馆藏国内唯一一套完整的近代中国海关贸易统计报告，该报告大部分在 20 世纪中日战争期间曾为日掠，战后归还中方。本书作者在南开大学研究中外经济关系期间深赖此报告。

端六、侯厚培、蔡谦、郑友揆等人对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整理和汇编^①。20世纪50年代,郑友揆在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深入研究了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的关系^②;20世纪60年代,姚贤镐在国内整理了1895年以前的对外贸易史料^③;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萧梁林(Hsiao liang - lin)又系统地整理了1864~1949年间的对外贸易统计资料^④;20世纪80年代,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主持编写了较为全面的中国近代时期的上海贸易史^⑤。

但以本书作者近年所见而形成的印象,以往对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资料性的描述上,极少有深入细致的经济学的探讨。这不仅导致论证上的缺陷,而且使经济史研究方法过于单一的弊端一直难有根本性的克服。

如果我们透过对外贸易的表象特征,进行稍深层次的经济学观察,则对外贸易利益和经济效益的问题就无法回避。长期以来,受政治史研究的影响,经济史学界一直认为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受制于列强在华特权所决定的制度框架之下,是帝国主义从经济上压迫中国人民、吸吮中国人民脂膏的管道。这种说法只停留在一种抽象性的议论上,缺乏细致的剖析。对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利益分配和经济效益进行实证性的经济学研究正是本书在选题时的着眼点。受资料和方法的限制,探讨对外贸易利益分配的条件目前还不成熟。因此本书选择了对外贸易经济效益分析这个题目。这个选题试图通过运用新的理论所能提供的方法,对已有资料进行重新的嫁接和组合,以期概括出近代

① 杨端六,侯厚培:《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国立中央研究院科学研究所1931年版;蔡谦,郑友揆:《中国各通商口岸对各国进出口贸易统计(民国八年、十六年至二十年)》,商务印书馆印行,1936年。

② 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

③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3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④ Hsiao Liang - lin: "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 1864 ~ 1949", Published by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⑤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对外贸易》,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中国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基本面貌，深化近代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史的研究。

新的理论及其所能够提供的方法是经济史学创新的关键^①。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进行方法上的突破，这种呼声已有近 20 年了。早在 1985 年，彭泽益先生和伍丹戈先生就著文探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计量问题和定量分析问题^②。1987 年，刘佛丁先生也针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上的失误提出了转变观念方法的问题^③。吴承明先生在 1992 年、1995 年和 1999 年先后三次著文详细探讨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④。在 1992 年的文章中，吴承明先生指出，可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除了传统的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之外，至少还有经济计量学的方法、发展经济学的方法、区域经济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系统论的方法五项；在 1995 年的文章中，吴承明先生尤其强调经济学理论的重要性，并开宗明义地指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并征引 J. M. 凯恩斯的名言：“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吴承明先生主张经济史研究同经济学理论完整、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各自走向自己的极端或者反面，他在评论诺贝尔奖获得者 R. M. 索洛的《经济史与经济学》时说：“他主要是批判当代经济学脱离历史和实际，埋头制造模型。但也指出当代经济史也像经济学同样讲整合，同样讲回归，同样用时间变量代替思考，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

① 见刘佛丁：《经济史学创新的关键在于新理论和方法的引用》，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 年第 1 期。

② 彭泽益：《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计量问题》，载《历史研究》，1985 年第 3 期；伍丹戈：《定量分析法在中国经济史的作用》，载《复旦学报》（社科版），1985 年第 5、6 期。

③ 刘佛丁：《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失误与观念方法的转变》，载《南开经济研究所年刊，1987～1988》，南开大学出版社。

④ 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 年第 1 期；《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 年第 1 期；《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 年第 1 期。

因此，本书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将经济理论的应用置于重要位置，因为“西方经济史学的发展说明，其创新的过程是新的经济学理论或某种其他新的社会科学理论，不断被引进并应用于历史研究，从而取得新的成果，使我们的认识得以深化的过程”^①。另一方面，也并不持门户之见，不带有倾向性，不重枣轻梨，正如同吴承明先生所指出的：“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② 因此本书既不排除一般叙述和定性分析，甚至不排除必要的从文献中寻章摘句，更不滥用计量方法和数量分析，一切皆依据于分析的需要和资料的可能性。

四、本书的结构和资料的运用

本书的结构按照导言第二部分所确定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益所包含内容的内在逻辑体系来设订。全书分两编：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微观分析和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宏观分析。在微观部分，分别分析了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条件和出口竞争力。对外贸易条件又具体分为综合贸易条件指数分析和个别贸易条件指数分析；出口竞争力既有相对于国际方面的贸易特化系数分析和国际市场占有率分析，又有相对于国内方面的出口优势指数分析。在宏观部分，分别分析了中国近代时期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变动之间的关系。首先分析了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进出口贸易对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产品市场扩大的重要影响；然后分别分析了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和资本形成之间的密切联系。

在资料的运用上，本书除了对西方经济理论文献的诸多引证外，主要还参阅了海关贸易报告和根据海关贸易报告编辑整理的统计资料。因为对外贸易经济效益问题并不仅仅涉及对外贸易一个方面，而

① 刘佛丁：《新时期中国经济史学理论的探索——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读后》，载《经济研究》，1997年第5期。

② 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